

札幌大学総合論叢 第47号 (2019年3月)

〈論文〉

传播学与后现代思潮的中日互动（绪论）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とポストモダンの日中協働

張 偉 雄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communication）は基本的な社会活動であり，個人，集団や組織の形成と存続には必要不可欠なものである。戦後日本と中国は直面していた国際関係は違っていたが，国際的なダイナミックな哲学思想の潮流に似通った反応が見える。学問としての思想が如何に社会实践と連動していくのか，日本と中国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分野の学問的生成，構築および発展を俯瞰することにより，ある側面を究明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とポストモダニズムの日本と中国の現象を探り，「伝達方法」として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如何に「伝達目的」の達成を実現していくのか，戦後日本や中国の学术界がどのように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通して現実社会に介入したのか，そして日本の最近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形態は中国のポストモダニズムとどのような類似性があるのか，関心のあるポイントである。本文は緒論として以上のポイントを巡って日中の文化人の「知的共通項」探求の一環としてまずは基本的な問題意識を提示する。

摘要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出现了一股被称为“新学院派”的思想潮流，他们“跨学科的，超越特定的学问领域进行思考与研究”。来自结构主义，符号学，走向后现代主义思潮。80年代以后，出现了“動物化的后现代”社会现象，将日本当今的时代称之为“Japan's Database Animals”时代，是Database消費的时代，那里使到“权威学霸无效”。而在中国从90年代至今，以“后现代”相标榜的各种理论思潮也层出不穷，其中有不少学者试图从中国的传统思想的角度去接近后现代思想，也有从生活方式改变与精神世界的变化的角度去考察中国的后现代思潮。本文试图从以上的视角梳理中日的传播学与后现代思潮的走向。

关键词：对话主义，快活知识，Database消費，《庄子》，北京马拉松，关注生态文明

一、Education Mission 阶段

我们探讨认知传播学的諸问题的时候，从多元视角下的角度探讨此学科的国际话语体系生成，建构与发展，亦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对于人类来说，communication 是基础的社会活动过程。关系到个人的发达，集体与组织的形成与存续，作为 communication 相互作用的结果，将会带来某种等质性与共通性。Communication 的原本语义就是分享，情报的交换，达到共鸣，取得他者的理解。”¹ 本文将从以上的观点探讨“日本战后传播学与后现代思潮的中日互动”的问题。关心点是作为“方法的 communication”，是如何到达作为“目的 communication”的。也就是说，日本的学界是如何通过“传播学”介入社会，造成了如何的传播现象与效果的，以及其与后现代思潮的关系。

日本传播学会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of Japan 是在 1971 年，作为太平洋传播学会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of the Pacific 的分会成立的。而作为学问体系的发展，在众多的划分模式中，笔者试图将其划分为以下的三个阶段。1, The United States Education Mission 阶段。2, New Academism 阶段。以及当今的 3, Otaku: Japan's Database Animals 时代。这三个阶段分别达到了以下的几种建设性的传播效应。1, 摆脱战前传播学的局限性促进了“对话主义”（話し合い主義）的形成。2, 填补了动荡时期的精神空白空间，满足精神世界的需求。3, 探索 IT 时代的新的出路，调动了创业精神，诱发出了新的消费。在各个阶段里，不同的传播主体，虽然其方法不同有，而其效果可以说是殊途同归，都实现了其传播行为的社会效应：情报的传达，双方的共鸣，社会的操控。

日本以二战战败为契机，传播学从德国式的“宣传”转到了以美国的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 mass communication。其注重“发信”以及“应答”的关系，关注传播（沟通）的效应。“传播行为的机能，不光停留在情报的传达上，而要达到促使情感共鸣，乃至制御对方的效果。”² 造成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契机，是 1946 年以联合国驻日总司令部的名义邀请来日的 The United States Education Mission 所提供的。此使节团影响制定了日本战后具体的教育方针。其中作为日本的国语教育，导入了“communication 的概念”。“将 communication 定位为社会生活的重要手段，在学校教育中加以强化。战后日本的教育家西尾实将 communication 译为“通じ合い”（互通）。这种教育的导入，促进了战后日本的“話し合い主義”“民主主義”的形成³。对于这个使节团所起的作用，有人称之为“教育领域里的《波茨坦宣言》”⁴。

1 《大日本百科全书》communication 词条

2 《心理学》東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3 渡辺通子「戦後初期話し言葉教育の史的検討 -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概念受容の変遷から -」東北学院大学教養学部論集 2017 年

4 石山脩平他「再びアメリカ教育使節団を迎えて - ミッション・レポートとカリキュラム」(座談会) 日本生活教育連盟編 1950 年

这个以美国为首的教育使节团多次来日，主要完成了以下的任务。1，负责调整过度时期的国语改革计划。2，制定使用罗马字的计划。3，研究更加民主的口语体表达形式⁵。他们的行动促使日本摆脱了战前传播学的局限性，使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渗透到教育领域，形成了对传播学目的意义的共识：促使情感共鸣，制御社会大众。

中国的传播学的发展也同样受到美国学派的影响，“1978年郑北渭先生在《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一期上译介的华伦·K·艾吉的两篇论文《公众传播工具概论》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作为开端，传播学在中国的学科化进程已经完整地经历了40年的历程”⁶。传播学在中国同样对社会发挥着其社会功能。在政治层面，主要体现为新闻改革的驱动。20世纪70年代末，新闻机构开始认真反思“文革”期间违背传播规律的沉痛教训，当时，新闻业界和学界都渴望深入了解传播规律。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于1982年访华，传播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传播学的一些关键概念，如媒介，信息，受众，反馈，效果等及其背后的基本原理，迅速普及开来，使传播研究和传播实践的面目一新⁷。

二，New Academism 时代

1. 对权威学霸的冲击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出现了一股被称为新学院派的潮流，他们跨学科，超越特定学问领域进行思考与研究。来自结构主义，符号学，走向后现代主义思潮。他们起到了对权威，学霸的冲击作用。1983年，当时20来岁的浅田彰的《構造と力》⁸成了畅销书，迎来了以法国现代思想为源头的后现代思想在日本的发展。他们的宗旨在《G S la gaya scienza》季刊杂志的创刊词中，做出了以下表述：“知识长期以来被重力的魔怪封闭，人们知识越多陷入悲伤的深渊就越深。学问做多了，就被幽闭在没有阳光的狭隘的洞穴里。我们的《快活知识》就是从正面突破，砸碎这一个构造。我们要设计一条新的线路，没有目的没有自我信仰的线路。不，正确地说，与其说是线路，倒不如说是装扮成线路一样的东西，那里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任由知识在那里移动，横跨，滑行”⁹。

2. 允许“众说纷纭”的精神文化世界

此学派的创造了如下的传播效应：精神世界的满足，学问空白期的填补。使政治思想的

5 「米国教育使節団報告書（要旨）」昭和二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6 胡翼青 张婧妍“中国传播学40年：基于学科化进程的反思”《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1期

7 张国良“中国传播学四十年的回望与前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8月3日

8 浅田 彰《構造と力—記号論を超えて》勁草書房1983年9月10日

9 《G S la gaya scienza》季刊杂志的创刊词1984年

对峙的状况活性化，回復了文化本来应有的創造力。他们通过提倡“快活知识”的追求，引导那些对知识的追求，寻找自我的年轻人得以打破“学霸”“权威”的控制，进入到一个允许“众说纷纭”的精神文化世界里。这是应运而生的一种思潮。当时的社会背景，有一些象征性的事件：1968年「東大紛争」以及「東大安田講堂事件」；1972年“連合赤軍事件”为代表的过激学生运动，反安保体制运动等等。

3. “文化多义并存”

在此满足“精神世界需求，填补学问空白期”的运动中，《文化と両義性》¹⁰的作者山口昌男起到了中心的作用。他的言论为思想文化的活性化，回復文化的創造力，打破“学霸”“权威”的控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学问上山口昌男从符号论，现象学的角度出发，着眼于“文化的兩义性”，以此为分析现象的中轴，创作出了分析社会文化新的理论。他认为“文化中多义并存”，新旧，正反，肯否，都可以装入同一个体系装置里，没有必要把其作为对立的东西来看。没有必要陷入二元对立。人们可以从文化的各种结构中，遭遇到这种混沌的局面。混沌=反秩序=反分類=反日常生活。

受法国的存在主义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艺界和教育领域引起了“萨特热”，在文学领域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的小说创作，集中体现在“反思文学”，1985年前后的“先锋小说”和“新写实主义小说”三种文学思潮上¹¹。

关于存在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展，有学者指出了存在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象征”话语的精神契合，以及存在主义激发起新的艺术创造意识和诗性诉求。“象征性思维是中国式存在主义文学的一种特定的艺术表现形态。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象征”话语与存在主义现象学的精神契合，为其积蓄了文化资源并提供了创作生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中国式存在主义文学又是一种由于文学语境的变迁，新的文化质素的出现激发起艺术创造意识和诗性诉求方式¹²。

三，動物化的后现代 Otaku 时代

1. 没有一个宏大的共通的“故事”

《動物化的后现代——从Otaku看日本社会》¹³为80年代以来日本的社会现象作出了有趣的概观。此书把当今日本称之为“Japan's Database Animals”时代，此时代里是

10 山口昌男《文化と両義性》岩波書店1975/5/30

11 葛莹“浅析萨特存在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特点”《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22期

12 杨经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象征化”《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3 東浩紀《動物化するポストモダン オタクから見た日本社会》講談社2001/11/20

Database 消费的时代。那里使到“权威学霸无效化”。后现代的今天，那里已经没有一个宏大的，共通的“故事”给我们去消费。是自发性，多中心的时代。从数据库中，消费者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进行二次创作。实现“キャラ萌え character moe”，各自将数据库中提取的素材创造自己的主人公。这是一个 Database 消费时代，“动物化”了的时代。作者基于这么样的一种推断：“只要你还在寻求与他人进行 communication，你还是人。但是当你不再去寻求 communication，只是满足于填充你的“缺乏”，你就是“动物化”了”。

2. “动物化的后现代”的传播效应

Otaku 系文化构造具有后现代的本质，观察动物化的后现代，可以从 Otaku 的消费行为的变动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的角度来看。Otaku 对漫画，动漫，电子游戏等大众文化，具有强烈嗜好性，他们是现代日本 communication 现象的考察点。这么一个“动物化的后现代”传播，其效应是巨大的：调动了 IT 时代的创业精神，Database 二次创造，实行的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创作模式，其中“cosplayer”（costume play）活跃份子多达数十万人。日本政府也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利用这么一种新的传播现象以及传播效应。因此，从 Otaku 的消费行动的变化，探讨当代日本的 Communication 的走向，是一个有效的视角。

在中国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传播学也发生着变化。中国学者认为进入 20 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迅猛发展，给传播学带来新的机遇，使之进一步成为备受青睐的“显学”。网络舆情，网络经济，网络文化，网络公共空间，网络治理等，成为业界，学界的关注热点，尤其是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出现，更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人际交往方式的变革，并波及组织沟通，大众传播的转型，其实际意义和研究价值已大大超出了传播领域¹⁴。这种网络传播无疑改变着中国的文化消费的方式，带动新的生产力的出现。

四，传统与后现代思潮的契合

在中国进入 2000 年代之后，主流媒体更关注后现代思想，讨论传统思想与西方的后现代思想的关系，讨论中国何时进入后现代。彭国华认为“《庄子》其许多理念却与当今西方的后现代思潮颇有契合之处，某些地方甚至为后者所不及。”¹⁵ 彭国华展开了以下的论点。

1. 关于“批判工具理性”

《庄子》对工具理性也进行了深刻批判。《庄子·天地》篇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子贡南游，

14 张国良“中国传播学四十年的回望与前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年 8 月 3 日

15 彭国华“从《庄子》的后现代意义说起”新华网 2009 年 5 月 5 日

在回程中看见一个老人抱着陶罐浇庄稼，觉得十分费力而且功效很低，就建议老人用一种叫“耨”的机械，一天能浇灌一百畦庄稼，功效大大增加。老人却笑着答道：“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老人所谓的“机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工具理性；所谓的“道”，既是自然之道，也是生命之道。《庄子》对“机心”的批判，对“道”的执着还可见诸多处，而且在深刻性上不亚于后现代思想家，在先见性上甚至远远超过了后者。

2. 批判“在场形而上学”和“言语中心主义”

根据彭国华的论点，与后现代思想相似的言论，《庄子》就要简洁明快得多。《庄子·秋水》篇指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正因为语言无法精确，充分地表达说话人的意图及所表述对象的内涵与特质，《庄子》对语言局限性的分析，进一步提出了“得意忘言”的观点。《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五、迈入后现代社会

2015年中国开放了马拉松赛事的国家审批，而北京马拉松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全程马拉松，中国学者房宁认为这是富有象征性的意义的后现代行为。他的主要论点如下。¹⁶

1. 马拉松“后现代社会显著的文化特征”

“马拉松长跑族是后现代社会显著的文化特征。快速的发展正在把中国带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马拉松运动的大发展标志着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改变透露出部分社会成员精神世界的变化，他们正在超越传统价值观，选择一种新的活法——后现代的活法。在这个意义上，有理由认为，2015年是中国开始迈入后现代社会的一年。”文章从生活方式的改变，分析社会成员精神世界的变化，得出了“后现代的活法”这么一个在中国出现的概念。

2. “灵魂出窍死而复生”与传统文化

房宁同时认为：“参加极限运动是后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马拉松则是极限运动中最典型和最普及的一种。大凡跑过马拉松的人都有过灵魂出窍，死而复生的体验。在今年我人生“首马”的漫漫征程上，我忽然感悟到马拉松哪里是什么健身？！42公里的奔跑是在碰触

16 房宁“2015：中国后现代元年”《环球时报》2015年12月16日

自己生命的极限。在到达极限的时刻，我明白了什么叫“通过痛苦走向欢乐”。”

“极限运动中，当人体糖原耗尽的时候，人就进入了空灵飘渺状态，存在与时间皆成虚无。奔跑，无尽地奔跑，可以排除世间一切烦恼，可以把跑者纯化为主体。马拉松却能让人享受孤独，感受到天地之间一人之存在。”

3.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视野

近年来中国的后现代思潮的研究出现了更多地关注生态文明，出现了从过程思维和建设性后现代的视野展开研究与实践的动向¹⁷。他们以整合视野及与中国传统文化契合作为方法论，“指出了中国现代化的困境，探讨了第一次启蒙的局限，即对自己的帝国主义态度，对传统的虚无主义姿态，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对理性的过分迷信，对自由的单向度理解”¹⁸等进行了梳理和反思。这些研究将学问放到现实社会的发展去考察，把学问研究与问题解决联系在一起，这是值得关注的动向。

小结：

纵观中日两国的后现代思潮，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后现代思想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但中日之间的后现代思潮的互动，与社会经济文化状态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都呈现出某种互动性与连续性。在应对后现代主义思潮方面，通过梳理中日两国的走向，能发现这种全球性的思潮在各地的共性与特异性，这有利于我们合理地与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磨合，通过与这个思潮的磨合，能有效地解决近代化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问题。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想，同时也是一种“生活风格”。

< 参考文献 >

1. 山口 昌男《文化と両義性》岩波書店 1975/5/30
2. 浅田 彰《構造と力—記号論を超えて》勁草書房 1983/9/10
3. 東 浩紀《動物化するポストモダン オタクから見た日本社会》講談社 2001/11/20
4. 彭国华“从《庄子》的后现代意义说起”《人民日报》2013年07月24日
5. 房宁“2015：中国后现代元年”《环球时报》2015年12月16日
6. 王治河 樊美筠《第二次启蒙》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
7. 戴元光 邵培仁 龚炜《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8年
8. 杨经建《存在与虚无—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论辩》人民出版社 2011年8月

※この小文は平成30年度札幌大学留学研修制度による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17 王治河 樊美筠《第二次启蒙》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1日

18 王治河“中国的后现代化与第二次启蒙”《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 第2期